

商代方国考古刍议*

何毓灵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北京 471000

Abstract: During the Shang Dynasty, the integrated structur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was further consolidated and strengthened. The archaeology of regional polities (fangguo) is as significant as that of capitals, closely related to studies of the Shang state formation, resource circulation, cultural exchange, and population movements. Compared to capital archaeology, the excavation and research of regional polities remain underdeveloped and require further advancement.

Keywords: Regional polity archaeology, capital archaeology, clan settlements; major communication route

摘要: 商代之时,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得到进一步巩固与强化, 方国考古与都城考古同样重要, 与商代国家形态、资源流动、文化交流、人群迁徙等研究息息相关。相较于都城考古, 方国考古发掘与研究还有待加强。

关键词: 方国考古; 都城考古; 族邑; 交通要道

《诗经·商颂》是对商王成汤及武丁宏图大业的颂歌, 成汤之时, “宅殷土芒芒”“正域彼四方”, 武丁之际, “邦畿千里”“肇域彼四海”。这自然是溢美之辞, 真实的图景究竟如何? 自甲骨文发现以来, 已有诸多学者对商代地理开展卓有成效的研究, 特别是商代晚期的地理图景取得突破性进展, 这其中自然离不开近百年以殷墟为代表的商代考古做出的突出贡献。研究者认为, “商代的政治地理可分为王畿、四土和四至三个层次, 王畿相当于内服, 四土相当于外服, 内外服属于商王朝的政治疆域, 四至则为疆域以外的范围”“晚商时期商人势力范围总体上表现为点、块、面的结合”^[1]。

《战国策·魏策》称“殷纣之国, 左孟门而右

漳、釜, 前带河, 后被山”, 此可谓文献记载的王畿之地。学者们依据甲骨文、金文、传世文献以及考古资料, 从不同的视角划定的王畿四至范围, 虽略有不同, 但大体认为太行山以东、古黄河以西、郑州以北、邢台以南这片区域应属内服的王畿范围^[2]。王畿之外之四土则非铁板一块, 完全被商王所掌控, 而是众多时叛时服的方国相互混居的状态。从考古学角度来说, 无论叛服, 均为考古发掘与研究的对象。正可谓“肇域彼四海”, 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 四土范围十分广阔。虽然早、中、晚商不同时期, 商文化分布范围略有变化, 但以河南为核心, 加上周边鲁、冀、晋、陕、鄂、皖等省的大部或部分地区, 大致对应于商王朝四土范围。四土之外的四至则更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阐释项目“考古学视域下的‘武丁中兴’”的研究成果。

中原文物
CULTURAL RELICS OF CENTRAL CHINA

为辽阔，主要是与商文化有广泛而深入交流与交往的青铜文化。近百年来，殷墟、郑州商城等都城考古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显然都城考古并非商代考古的全部，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本文采用“方国考古”一词指代除郑州商城、偃师商城、洹北商城、殷墟等都城考古之外的商代考古发掘与研究，如此便于探讨商代都城之外商代考古重要成果。

一

殷墟是中华文明探源的基石，以殷墟考古为出发点，历经几代学者不懈努力，至20世纪末，商代考古编年体系已十分完备，以殷墟为代表的晚商文化上溯至以小双桥遗址为代表的中商文化、以郑州商城为代表的早商文化、以下七垣遗址等为代表的先商文化、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夏文化等，年代序列连续，文化特征清晰。与都城考古几乎同步，大量的商代方国遗存也因各种原因被发现，都城考古的年代框架、文化特征自然成为方国考古对比的标尺，这极大地促进与深化了商代考古研究。反之，方国考古也从不同角度与层次推动了都城考古。近20年来，商代方国考古发掘与研究取得新进展。

与20世纪90年代之前相似，近20年来，早商至晚商方国遗存的发现仍具有相当大的偶然性，城镇化建设与盗掘是主因，新郑望京楼^[3]、济源柴庄^[4]、正阳闰楼^[5]、荥阳小胡村^[6]、浮山桥北^[7]、闻喜酒务头^[8]、栾城周家庄^[9]、灵寿西木佛^[10]等遗址或墓地均因此而发现。但近20年来，方国遗存的发现与发掘也有突出的变化，由被动变主动的发掘与研究越来越多。首先是对已知遗址进行系统性调查与发掘，盘龙城商城^[11]相关工作尤为突出，另外如大辛庄遗址^[12]、西吴壁遗址^[13]等工作也基本如此；另一个突出变化是对偶然发现的遗址开展系统性调查与发掘，清涧寨沟^[14]等是突出代表。此外，近些年来区域考古调查工作也极大地推动着方国考古的进程。

近些年来，关于方国考古的研究也有诸多突

破性进展，《中国考古学·夏商卷》^[15]对商代早、中、晚期不同区域的类型学研究，可视为2000年之前考古学者对方国考古研究成果的梳理与总结。在此基础上，近二十余年，众多学者对关中地区^[16]、汉中地区^[17]、长江中游^[18]、长江下游^[19]、江淮地区^[20]、海岱地区^[21]、太行山东西两侧地带^[22]、郑洛地区^[23]等等不同阶段的商文化进行更为细致的研究，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区域文化的特质，以及不同区域间的互动、交流与影响。多学科融合，特别是科技考古研究各区域文化与同时期的都城间文化交流、资源配置、人群迁徙等问题成为首选，成果也最为突出。另一方面，方国考古发掘与研究取得的重要成果也极大地推动了都城考古学研究。运用文化因素分析法，在都城遗址内区分出大量的“外来文化因素”^[24]，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方国考古取得的新成果，区域考古学文化特征越来越显著，方国考古与都城考古之间文化异同对比更加明显。与早、中商文化相比，晚商文化研究更有甲骨文、金文，甚至是传统文献等优势。随着各类材料不断丰富，研究理论与方法不断更新，众多学者从文字、文献角度，结合考古材料开展方国地理^[25]、聚落结构、社会形态、政治经济等全方位综合研究，取得的成就也远超从前。

二

方国考古取得诸多重要进展的同时，也要客观地认识到，目前方国考古也存在不足，有待进一步深化之处，以下三个问题较为突出。

首先，方国考古存在明显的重墓地轻居址现象。这种现象由来已久，在晚商时期最为突出。从目前已报道的材料来看，太行山西侧的灵石旌介^[26]、浮山桥北、闻喜酒务头等墓地，太行山东侧的定州北庄子、栾城周家庄、灵寿西木佛等墓地，黄河以南的荥阳小胡村、正阳闰楼、罗山天湖^[27]等墓地，均以发现具有家族性质的墓地、出土大量青铜礼器而闻名，但与墓地同时期的居址状况如何，则知之甚少。近些年来，陆续有文

物部门开始着手以墓地为线索,调查同时期的居址,但相关的报道极少,更难有深度的研究。而在晋陕高原地区,近些年方国考古取得重要突破,墓地与居址均有发现,这为研究王畿之外方国族邑结构、社会形态、政治经济等奠定了坚实的材料基础,而不再仅仅立足于墓地,甚至是一些被盗掘出土的青铜器。

方国考古不仅仅是方国族邑自身之问题,实则与王畿都城考古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殷墟是否存在族墓地就是其中较为突出的问题,方国考古为解决这一世纪难题提供了重要线索。已有方国墓地资料表明,方国墓地一般都是单一家族墓地,如先、亚禽、息等,少有难以判定族属的现象,这说明在方国族邑内,族墓地是存在的。认为殷墟没有族墓地的学者多以殷墟西区墓地为例,指出该墓地有多个家族或家庭墓葬混杂,不存在规划有序、较为单一的家族墓地。而方国族邑墓地又表明,此时族墓地是存在的。这种不同,应与都城之内空间局促狭窄,不同家族政治沉浮,而方国族邑之内空间相对宽敞,同一家族延续相对稳定等原因有极大关系。

其次,方国考古存在着重主干轻枝蔓现象。这里的主干指方国族邑墓地或遗址,而枝蔓指的是方国族邑之下更次一级或两级的中小型遗址。近些年来,某一区域或流域之内的聚落考古方兴未艾,这对于研究该区域之内聚落形态、资源环境、生业模式等问题至关重要。如果更进一步放大空间,以山川河流、地形地貌、交通路线等为依据和线索,更能清晰地看到由都城、族邑、中小型遗址等编织而成的整个王朝国家的网络,共同完成资源流通、文化交流、人群互动等。以殷墟为中心,往北或往南每隔50公里左右就有一个重要的方国族邑,这是南北交通网上的重要节点。实际上,再以方国族邑为中心连接四面八方,特别是山间要道、河流渡口等,次一级的枝蔓性遗址更是星罗棋布。这些主干与枝蔓共同组成王朝国家的参天大树。

最后,方国考古研究也存在着重共性轻个性问题。有学者认为,商代早期或二里岗文化十分

强势,即便是二里岗文化有不同类型,不但以陶器为代表表现出很强的文化一致性,同时期的青铜礼器更是如此。这种考古学文化的共性或一致性是研究商王朝政治疆域或文化影响的重要依据。也有学者认为,到了商代晚期,商文化势力范围较早、中期有所收缩,特别是在西方,基本已退出关中,豫西、晋南地区也十分少见晚商文化。但近年发现的运城地区闻喜县酒务头墓地表明,虽然贵族墓葬有自身的特色,但其与殷墟都城之内贵族墓葬有高度的一致性,按类型学划分,最有可能是晚商文化的地方类型,而不是另一种考古学文化。与灵石旌介、浮山桥北等方国族邑一样,这里同样应是商王朝在此布局的扼守重要交通要道的方国族邑,以镇守、拱卫王畿。但如果仅以陶器作为判定标准就会发现,酒务头墓地陶器地方特色浓郁,个性十足。这提醒研究者,商文化经历商代早、中期近三百年持续发展之后,作为普通生活用具的陶器,其地区特色大大增强,而如果仍与殷墟陶器相对比,势必有很大区别,甚至得出是两种考古学文化的结论。因而在方国考古研究中,要针对不同阶段、不同区域、不同器物等多种情况进行综合判断,在重视区域文化共性的同时,也要充分重视其个性差异的具体原因,否则会产生很大的认知偏差。

三

在充分认识到方国考古重要性与必要性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做好方国考古呢?以下三个方面可供参考:

其一,以青铜礼器为线索。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许多地方因种种原因发现了大量夏商周时期的青铜礼器。细致梳理与调查就会发现,在中原地区黄土地带,出土青铜礼器的地点往往就有同期遗址,诸多重要遗址也因此发现,小双桥遗址就是典型代表,因偶然发现的青铜构件促使系统性地调查与发掘。近年,河北省灵寿县西木佛遗址又有墓葬、车马坑等重要发现,这表明1978年偶然发现的亚伐铜卣一定不是孤立存在

的。诸如此类现象很多,在进行考古学调查时,曾经出土有青铜礼器这样的线索值得高度重视。

其二,以族邑墓地为抓手。正如前述,商代方国族邑往往是墓地与居址相距不远。近些年来,清涧寨沟、栾城周家庄、灵寿西木佛、济源柴庄等都陆续发现同期的墓地与居址,甚至发现有环壕。要想深入推进方国考古,可以有针对性地对方国族邑墓地开展系统调查与勘探。惟如此,随着资料的不断积累,才能对方国族邑的规模、布局等深入研究。

其三,以交通要道为纲要。地形地貌与山川河流深刻影响与塑造了古代的交通形势,也深刻影响着人类的生产生活。以河流、盆地、道路等界线的考古学调查是聚落考古的基本方法。扼守交通要道的关隘、渡口等是方国都邑选址首要考虑的因素,这从太行山东、西两侧分布的商代遗址就可清楚地了解到。所谓的太行八陉,自古以来就是沟通东西的重要交通路线,而在其两侧往往会有重要遗存,闻喜酒务头与济源柴庄分别位于中条山东西两侧,就是最好的例证。前文也提及,大体沿现京广线,以郑州商城、殷墟为中心,南北方向以约50公里为间隔,发现一些重要的方国族邑,但有些方国族邑之间的距离太长,这说明中间可能还存在未被发现的重要族邑。由京广线往东,郑州以南的淮河流域往往是以西北、东南走向的河流为交通要道,在豫东、皖西地区也有青铜礼器出土,这些青铜礼器的分布点应与渡口、码头有很大的关联性。而郑州以北区域,情况也相似,发源于太行山东麓的河流往往向东注入古黄河。近年在内黄县河村遗址发现的殷墟时期的墓地,表明其应与古黄河有关。可惜的是,无论是江淮地区,还是古黄河区域,泛滥淤积给考古调查与勘探造成极大的困难。

当前,国家正在开展第四次文物普查,并继夏文化研究项目之后启动夏商文明研究工程,这均是深入推进商代方国考古的最佳契机。相信在不久将来,商代方国考古一定会取得更丰硕的成果。基于商代方国考古已有成果,以及仍然存在的突出问题,《中原文物》推出了“商代方国考

古研究”专题,期待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从而把方国考古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 [1] 孙亚冰,林欢.商代地理与方国[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30.
- [2] 何毓灵.考古学视域下的晚商王畿格局与周革殷命策略[C]//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第21集).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23.
- [3]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新郑望京楼:2010—2012年田野考古发掘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
- [4] 梁法伟,王豪.河南济源柴庄遗址发现商代晚期至西周前期大型聚落[N].中国文物报,2020-4-3(7).
- [5] 驻马店市文物考古管理所.河南驻马店闰楼商代墓地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2018(4).
- [6]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荣阳小胡村商周墓地[M].北京:中华书局,2022.
- [7] 桥北考古队.山西浮山桥北商周墓[J].古代文明(辑刊).2006(5).
- [8]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运城市文物工作站,闻喜县文物局.山西省闻喜县酒务头商代墓地发掘简报[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2(10).
- [9] 张文瑞,郝娇娇.新时代河北考古工作回顾与展望[N].中国文物报,2022-7-29(6).
- [10] 河北省文物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厚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河北考古取得重要成果[N].中国文物报,2024-1-23(5).
- [11]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遗址博物院.盘龙城(1995—2019)[M].北京:科学出版社,2024.
- [12] 方辉.大辛庄遗址研究·资料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
- [13] 中国国家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运城市文物保护中心.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2020年发掘简报[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3(6);中国国家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运城市文物保护中心.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2021年发掘简报[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3(6);中国国家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运城市文物保护中心.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商代墓地2022年发掘简报[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3(6);田伟,叶之童,张开亮,孙慧琴.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2023年IE5区发掘简报[J].文物季刊,2024(3).
- [14]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榆林市文物保护研究所,清涧县博物馆.陕西清涧寨沟遗址鱼塔梁商代墓葬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24

- (2); 孙战伟, 于有光. 陕西清涧寨沟遗址后刘家塔商代墓葬发掘简报 [J]. 考古与文物, 2024 (2);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 榆林市文物保护研究所, 清涧县博物馆. 陕西清涧县寨沟商代遗址 [J]. 考古, 2024 (2).
- [1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中国考古学·夏商卷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 [16] 张天恩. 关中商代文化研究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4.
- [17] 陈坤龙. 汉中出土商代青铜器的科学分析与制作技术研究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22.
- [18] 豆海峰. 冲击与调适: 长江中游商代文化与社会演进的考古学观察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21; 孙卓. 南土经略的转折——商时期中原文化势力从南方的消退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9; 黎海超. 资源与社会: 以商周时期铜器流通为中心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
- [19] 赵东升. 中原王朝视角下的南方和东南方——青铜时代长江中下游地区中原化进程研究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21; 白国柱. 长江下游地区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研究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23.
- [20] 徐峰. 过渡带: 两淮地区早期社会进程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0.
- [21] 燕生东. 海岱考古与早期文明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9; 毕经纬. 问道于器: 海岱地区商周青铜器研究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
- [22] 张渭莲, 段宏振. 中原与北方之间的文化走廊——太行山东麓地区先秦文化的演进格局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5; 常怀颖. 夏商时期古冀州的考古学研究·文化谱系篇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3; 曹大志. 贸易网络中的黄土丘陵 (BC1300-1050)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1; 蒋刚. 文化的演进与互动: 太行山两翼夏商西周时期青铜文化研究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7.
- [23] 侯卫东. 郑州商城与王畿区域聚落考古研究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4.
- [24] 何毓灵. 殷墟“外来文化因素”研究 [J]. 中原文物, 2020 (2); 何毓灵, 赵清荣. 殷墟北徐家桥墓地“南方文化因素”器物及相关问题 [J]. 江汉考古, 2023 (4); 牛世山, 郭梦. 殷墟考古90年——陶器的发现与研究 [J]. 南方文物, 2018 (3).
- [25] 孙亚冰, 林欢. 商代地理与方国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 [26]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灵石旌介商墓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6.
- [27] 河南信阳地区文管会, 河南省罗山县文化馆. 罗山天湖商周墓地 [J]. 考古学报, 1986 (2); 信阳地区文管会, 罗山县文管会. 罗山蟒张后李商周墓地第三次发掘简报 [J]. 中原文物, 1988 (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信阳市博物馆, 罗山县博物馆. 河南罗山天湖商周墓地M57发掘简报 [J]. 华夏考古, 2016 (2).

(责任编辑: 向祎)